

甲骨文與公衆考古學



透過互動網頁傳播甲骨文知識（引自歷史語言研究所「甲骨文與世界記憶」
網頁：<http://oraclememory.ihp.sinica.edu.tw/home.htm>）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5 期 2013.11

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形成與甲骨文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安陽小屯出土甲骨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即組織考古隊到那裡找尋甲骨，並因而發現了小屯殷墟，接著又在那裡進行了 14 次發掘，促成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啟動。而甲骨文的研究，也由於近代考古學科學方法的引入，得以突破了傳統金石學的侷限，而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在過去八十多年中，甲骨文的研究在考釋、斷代、分期，以及商代歷史研究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未來，還有一項甲骨文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即是與公眾考古學的結合。公眾考古學是近年來考古學發展的一個新領域，其目的是要將考古學研究所獲得的學術知識傳遞到公眾當中，俾有益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推廣。甲骨文獨特的製作材料與製作技術，象形或會意文字所具有的趣味性、與現代漢字之間的傳承性，以及文字內容所呈現歷史資料的知識性與故事性，無疑是非常適合進行公眾考古學的題材。本文將就甲骨文與公眾考古學的結合作一申述。（圖一）



圖一：普及考古知識是公眾考古學的主要目的。圖為二〇〇七年文建會主辦「考古知識普及計畫——考古小偵探」巡迴展示車。

一、甲骨文與中國考古學

中國雖然有很長久的金石學傳統，但是以田野工作與科學研究為主要取向的現代考古學，是到了清朝末期以後才從西方傳入。現代考古學之所以能在中國發生，一般可歸諸於三個主要原因：其一，是中國固有的好古傳統，經過宋代的發展成為金石學的高峰，有清一代，更從金石碑刻，擴及到璽印、封泥、畫象石、瓦當、錢幣和墨硯等各類文物，到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域木簡、敦煌文獻和殷墟甲骨出現之後，使中國的金石學傳統，別闢蹊徑，容納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其二，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西方人紛紛來到中國蒐集古代文物，如安特生（J. G. Andersson）、桑志華（Pere Emile Licent）和德日進（P. Teilhard de Chardin）等在華北一帶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把西方現代考古學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帶來中國。此外，西方現代考古的基本概念，也隨著若干中國歷史學者，如章太炎、梁啟超等的新史學思想的著述，以及李濟將在美國所受到的人類學訓練帶回國內。其三，是五四運動開始的疑古風

潮，使當時的學術界普遍認識到需要有新的史料來解決中國古史問題。^①但是在這種氛圍之下，發揮臨門一腳作用的，卻是甲骨的發現。

甲骨文是商代所遺留下來最珍貴的一類歷史文物。甲是龜甲，骨是獸骨，古人用甲骨占卜吉凶，並在其上契刻卜辭或記事刻辭，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最初是由小屯村民翻耕農田時偶然發現的，他們將之視為龍骨，售予藥店。後為古董商知悉，兜售於京津一帶。一八九九年，國子監祭酒王懿榮首先認出甲骨文是古代文字，引起了學者的重視和收藏。一九〇三年，劉鶚（鐵雲）將搜購所得的五千片甲骨文中選拓一千零五十八片，編為《鐵雲藏龜》六冊問世。這是第一本公布甲骨文的書籍。次年，孫詒讓依據劉鶚公布的資料，考釋其中文字，寫成《契文舉例》，這是第一本考釋甲骨文的書。而後，羅振玉廣為搜羅甲骨，獲三萬片以上，先後編成《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後編》、《殷虛書契考釋》等書，但是羅氏的主要貢獻之一是考定出發現甲骨的河南安陽小屯即是《史記·項羽本紀》中所說的「殷虛」。^②

這一考定，誠如戴家祥所言：「對殷商的歷史研究來說，是指出了最可靠和最基本的方向。」^③因而促成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在成所之初，即急於到殷墟調查。^④胡厚宣先生概括當時史語所急於發掘殷墟的直接原因約有四點：

首先因為甲骨文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多少年來歐美日本帝國主義大量購甲骨，引起了販賣者、集體挖掘，所出甲骨多已杳無下落。其次是這樣非科學的挖掘，多經一次，即多一次損失。因只知搜求甲骨，卻毀壞了他種器物，擾亂了地下的情形。三則殷墟遺址因有甲骨，時代明確，可以作為其他遺址的尺度準繩。想要解決其他遺址的問題，必先發掘殷墟。四則應用近代考古學的科學方法發掘殷墟，除了挖掘甲骨文字之外，更重要的是注意地下情形，搜尋其他器物。工具、人骨、獸骨，以解決一切甲骨文字所不能解決的殷代整個文化的問題。^⑤

① 參見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夏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3：193-196；Kuang-chih 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2 (1981): 156-169.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湯曼白，《考古學概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蔡鳳書、宋百川，《考古學通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8）；臧振華，〈考古學〉，《中華民國史·學術志》（臺北：國史館，1996）。

② 參見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刷）。

③ 戴家祥，〈甲骨文的發現及其學術意義〉，《歷史教學問題》1957.3：20-23。

④ 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人傅斯年認為中國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當務之急，便是要直接研究材料，開拓研究材料，擴張研究工具；他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規劃的第一步工作，即是到安陽易州一帶考古：「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安陽至易州，安陽殷墟以前盜出之物並非徹底發掘，易州邯鄲又是燕趙故都，這一帶又是衛邶故城。這些地方我們既頗知其富有，又容易達到的，現在已著手調查及佈置，河南軍事少靜止，便結隊前去。」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9。

⑤ 參見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頁22，引述胡厚宣在《殷墟發掘》（1955）中所言。

所以，甲骨文的發現與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可謂關係至為密切。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六年之間，史語所在殷墟進行了長達十年總共十五次的發掘工作，成為第一個「由中國的學者們與中國的學術機關自己來做的考古工作。」^⑥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在另一方面，甲骨文的研究也因為與現代考古學的結合，而得以突破金石學的傳統，對中國古史，特別是殷商一代的歷史與社會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產生了多方面的貢獻。從甲骨文研究的歷程來看，這門學問在史語所發掘殷墟之前的研究，主要侷限於幾個方面：首先是《鐵雲藏龜》的出版，將甲骨文從古董辨識為可資研究的資料。此後，《殷虛書契》與《殷虛書契菁華》等著錄之出版，公布了大批甲骨文。此後，孫詒讓《契文舉例》與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開啓了釋文先河，使甲骨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直到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商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證實《史記·殷本紀》所記載殷代帝王世系大致正確之後，甲骨文才開始被認定為商史研究的史料。不過，這一期間，甲骨研究主要集中於資料整理和文字考釋方面，商史研究所佔比例較小，總體的研究方法依然把甲骨當作是個別的古物，未完全脫離傳統金石學的模式。

到了殷墟發掘之後，由於加入了現代考古學的科學觀念與記載方法，使考古學與金石學產生了很大的分野。^⑦甲骨文的研究自然也起了明顯的改變。特別是甲骨文透過有系統的考古發掘出土，確定為殷王都之遺物後，大大提高了學術的價值，突破了金石學只重文字的興趣，而擴大了甲骨研究的範疇。誠如董作賓所說：

從民國十七年的秋天，國立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以來，甲骨文的研究範圍，有自然而然要擴大的趨勢，於是漸漸走出由拓片上文字的研究，進而注意到實物（甲與骨）的觀察；由實物而又注意到地層；注意到參證其他遺物；注意到比較國外的材料。換句話說，就是從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進而至於考古學的研究了。^⑧

什麼是考古學的甲骨研究？從董先生所列出的研究範圍^⑨（詳下表），給了非常清楚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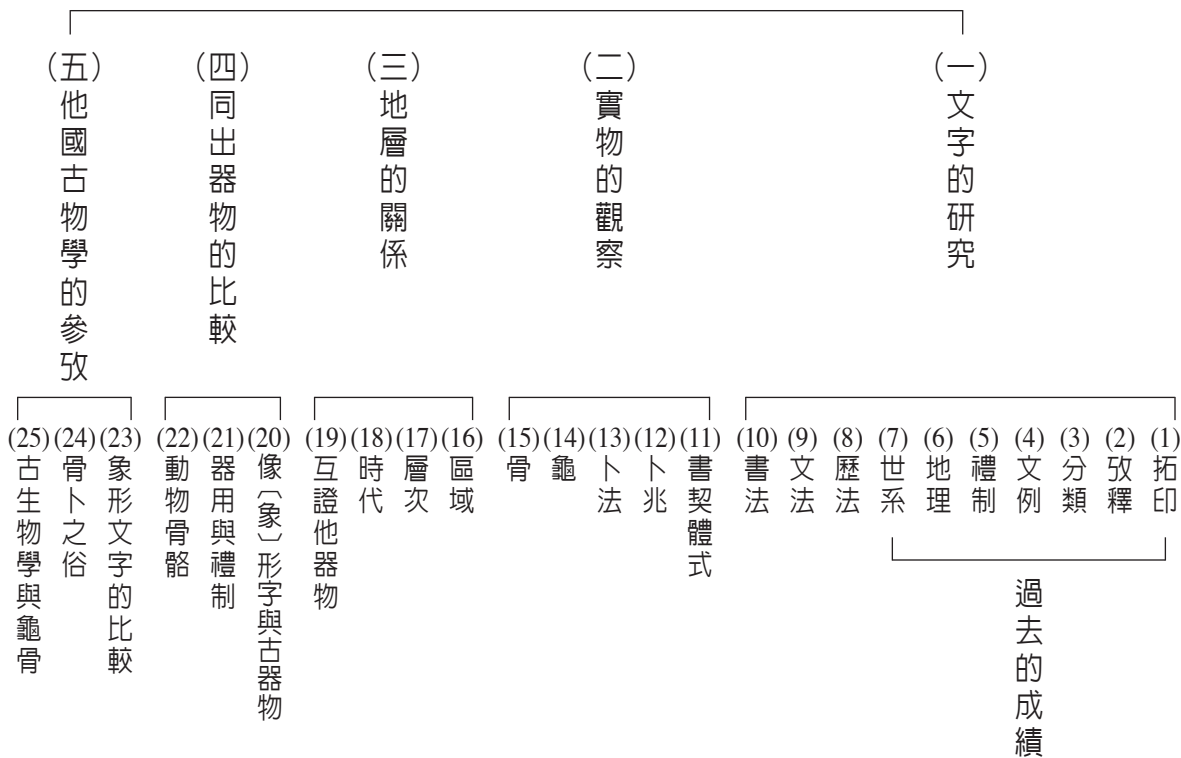
⑥ 李濟，〈我與中國考古工作：〉，收入《歷史圖外》（臺北：萌芽出版社，1970），頁1-8。

⑦ 李濟，〈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安陽發掘報告》（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一，1930），第2冊，頁405-410。

⑧ 董作賓，〈甲骨文研究的擴大〉，《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頁412。

⑨ 同上註。

甲骨文研究的擴大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以考古學為基礎的甲骨文研究，在過去八十多年中，獲致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尤其是對殷商的歷史研究更有重大的影響。石璋如先生曾列舉甲骨文研究對於殷史至少有十大貢獻：^⑩

(一) 認字：「據董先生估計，貞卜所用的文字，最多不能超過三千字。現在並可瞭解許多詞句，使若干學者能夠直接誦讀三千年前殷人手刻的一等材料，而運用到研究殷史上面，這卻是第一個極大的貢獻。」

^⑩ 石璋如，〈殷虛發掘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學術季刊》2.4（1954）：1-16，中漏列第二項貢獻，故實際只有九項。

- (三) 考釋：「甲骨影印本之使用，只限於少數認識甲骨文字者，而大多數不認識甲骨文字者，仍是瞠目所無用，爲解除這個困難供給一般之使用計，故有釋文之舉。」
- (四) 編纂：「把卜辭分類纂集，使研究殷代文化者便於翻檢……，對於殷史研究諸多便利。」
- (五) 人物：「自從甲骨文發現到現在，在甲骨上所發現的人物恐怕增多了若干倍，若貞人，若小臣，以及其它等。」
- (六) 地域：「殷代的地理從前所知道的甚少，近由於田獵征伐的研究，對於殷代的地名已經增多……，不但給殷代地理上擴大版圖，對於殷史上亦有很大的貢獻。」
- (七) 斷代：「董先生根據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法等十個標準，把八世十二王分爲五期……，這樣一來，甲骨在時代上予以判分了，這對研究契文有許多方便。」
- (八) 曆法：「董作賓先生繼斷代研究的研究，爲殷代的曆法，選擇有年月的甲骨運用斷代的標準，根據日食、月食等天象爲據點而排比起來，成爲殷曆，不但有王有年，而且有月有日，對於殷代史料的處理貢獻甚爲重大。」
- (九) 禮制：「董作賓先生根據禮典、曆法、文字、卜事等四點，而研究出殷代的禮制分爲新舊兩派，……這個發現，實爲前所未聞，對於殷史卻是一大貢獻。」
- (十) 其它：「此外根據卜辭研究殷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農業、氣候、物產以及其它等。」

以上這些貢獻，可以說是甲骨文研究及其學術貢獻的全面性總結。根據目前不完全的統計，殷墟歷年出土之甲骨，目前收藏於公私機關及個人處所者，至少約有 15 萬片，各種著錄甲骨文的專書和論著已達 180 種以上，中外學者先後從事甲骨文研究的有 400 多人，共發表甲骨文資料和研究文獻約 5,000 種（篇），^⑪ 在在顯示甲骨文研究在過去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瞻望這門學問的發展，當然還有許多新的研究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探究。不過，爲了因應目前社會型態的變遷及資訊時代的來臨，將甲骨文的研究侷限在專業學術社群的傳統，勢將面臨挑戰。因此，在未來，如何將

^⑪ 范毓周，〈甲骨文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史學月刊》1999.2：3。

甲骨文的知識廣泛傳遞給社會大眾，並有助於保護與發揚此一珍貴的文化遺產，無疑將是甲骨文研究的另外一項重要任務。而這正是公衆考古學的目標。

二、公衆考古學的發展

現代考古學是源於歐洲，但是它的發展是經過了長久的歷史。考古學最早只是源於王公貴族與富有人士對於古物的一種嗜好與收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有一些王公貴族及學者對古典時代的文物進行蒐集與研究。從十七世紀開始，有學者開始對一些遺址進行發掘，並發展出一些比較科學的方法。但是現代考古學是要到十九世紀中葉才正式成形。¹² 然而，在考古學研究現代化以後，這門學問從發現到研究，主要是在學者的社群內進行，與一般社會大眾似乎並沒有產生密切的關係，甚而有嚴重的隔閡。這一方面是由於考古知識的專業化，不容易被大眾所解，另一方面，考古的發現與研究對國計民生並無明顯的助益。不過，這種情形在近二、三十年來，隨著「公衆考古學」的出現，已經有了變化。

「公衆考古學」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美國考古學者 C.R. McGimsey 於一九七二年所出版的 *Public Archaeology* (New York: McGraw Hill) 一書。此後即被廣泛使用。這個名詞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因應文化資產管理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RM]) 的需求，而必須吸收非專業的社會大眾來協助。所以公衆考古學起初主要是為 CRM 服務，以與學術研究的考古學區別。但是，這樣的公衆考古學，仍然是由專業考古學者主導，民衆只能夠間接地參與，而不能直接從考古學獲得知識與興趣。因此，近年來，考古學者已經逐漸瞭解，民衆對考古學的興趣被不當地侷限在 CRM，而開始發展出與公衆有更密切關係的考古學連結，其目的就是要將考古學研究所獲得的學術知識傳遞到公衆當中，俾更有益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推廣 (圖二)。¹³



圖二：遺址現場解說普及考古知識之重要方法；本文作者在遺址現場為公衆解說。

¹²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Archaeology-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8).

¹³ Nick Merriman, Introduction: diversity and dissonance in public archaeology, in Nick Merriman (ed.) *Public Archae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18.

其實，公眾考古學的發展，也有其社會的倫理基礎：文化資產是屬於社會大眾的資產，它不應當僅僅是滿足考古學者的研究需求，用來解決學術的問題，它也是表達歷史傳承與凝聚人類認同與感情的載體。因此，對於考古學所獲得的知識，自然應當透過適當的傳遞管道與解釋方式分享給社會大眾或與大眾產生互動，而不能被少數專家所掌握。此外，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考古學的知識與當今社會的一些議題，都有密切的關聯性，例如，除了文化資產保護之外，在族群、環境保護、文化永續、觀光旅遊、博物館展覽、公眾教育推廣等議題上，也都需要與社會大眾密切互動。有鑒於此，目前公眾考古學已經在考古學中蔚為潮流，包含了相當豐富的議題，為考古學研究增添了一個新的取向（圖三）。



圖三：博物館是公共考古的重要場域之一；圖為公眾在南科考古陳列室參觀考古出土文物。

三、甲骨文是一個公眾考古學的好題材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甲骨文的研究及其所獲得的知識，主要是侷限在專家的範疇，所出版的著作大都極為專業、艱澀難懂，而有關甲骨文的知識普及與公眾考古活動亦相當稀少，社會大眾自然望而卻步，難以一窺甲骨文的堂奧。其實，甲骨文所具備的一些特質，可以是公眾考古的極佳題材。茲例舉如下：

（一）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的故事性與傳奇性

甲骨文從被農民發現，兜售於京津一代當作是刀尖藥，後被學者辨識為古文字而加以蒐藏，成為研究的資料，以至於殷墟發掘出埋積大量甲骨的甲骨 127 坑，成為研究殷商歷史的寶庫。這段發現與研究的過程，可謂充滿傳奇性與故事性，對社會大眾而言，極具趣味，非常適合透過通俗書刊，媒體或博物館展示加以傳播。¹⁴

¹⁴ 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於二〇〇六年舉辦「YH127 發掘七十週年紀念特展」，並出版由李宗焜撰述的導覽手冊《當甲骨遇上考古——導覽 YH 127 坑》（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

（二）甲骨文的政治材料與技術的特殊性

甲骨文是用龜甲及獸骨，在其上契刻占卜吉凶的卜辭或其它記事。無論就所使用的材料、政治鑄鑿的技術，以及占卜的程序，都充滿原始神秘感，而引人好奇，是博物館展示或民衆體驗的動人題材。

（三）甲骨文書法的美學及藝術性

甲骨文雖然主要是契刻文字，但是筆觸沉著勁健，臨摹成書法，頗富美感，藝術性極高，甚受民衆欣賞。可藉以增加民衆對甲骨文字的認識。董作賓先生即熱衷於以中國傳統的書法藝術來宣傳甲骨文。他認為「在殷代，已由圖畫變成了符號。這種符號，完全用線條書寫，這種線條有剛健、柔媚，各種不同的姿態，尤其在一些象形字中，很接近大寫意的原始圖畫，所以看起來就非常美觀。」¹⁵ 董先生從不吝嗇贈送他的甲骨文書法，胡適先生說過：「他從太平洋到大西洋，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他不但摹寫甲骨文字，並習慣在甲骨文旁注以釋文，以便讓更多人認識甲骨文，來普及甲骨文。¹⁶ 所以董作賓先生其實早已是公衆考古學的實踐者。

（四）甲骨文字內容的趣味性

甲骨文主要是占卜的記錄刻辭，除了關於占卜某時某日的吉凶、祭祀、征伐、狩獵和年成的豐欠以外，還有占卜天氣風雨、出行、生育、孩子、疾病等等。因此，甲骨的內容涉及當時天文、曆法、氣象、地理、方國、世系、家族、人物、職官、征伐、刑獄、農業、畜牧、田獵、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災禍等。從這些記錄中不但可以了解商代社會的歷史、文化與語言文字，同時也可發現殷商歷史中許多有趣的史實。

（五）甲骨文的字體變化及其與漢字傳承的關聯性

甲骨上的文字，有契刻的，也有毛筆書寫的，目前能夠辨認的已接近兩千。這些甲骨文字，已經從圖畫象形演變為以線條表示的文字，雖「六書」具備，但尚在變化之中，並未全部定型。¹⁷ 不過這些文字卻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漢字，其中有許多可以與現在的漢字相互對照，顯示其演變與發展的軌跡，饒富趣味。

¹⁵ 董作賓，〈甲骨文書法〉，《董作賓與甲骨學研究續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215-216。

¹⁶ 暴希明，〈董作賓與甲骨文的宣傳普及工作〉，《董作賓與甲骨學研究續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18-21。

¹⁷ 參見前引吳浩坤、潘悠，《中國甲骨學史》，頁97。

四、結語

甲骨文的發現是一個偶然，但是這些偶然出土並被當作是「龍骨」的殘骨，不但透露了殷商王都所在的訊息，而且也促成了由中國人自己所做的第一個現代考古學的工作。接續而來結合考古學方法與理念所進行的甲骨文研究，不但大大豐富了殷商的歷史，並透過卜辭生動地呈現出商代獨特的占卜習俗與其內容。以它們在史料保存、文字書體、製作技術，占卜紀錄與歷史記事等方面所顯示的珍貴性與獨特性，將之視為人類歷史的瑰寶，絕不為過。遺憾的是：關於這些甲骨文的知識，過去主要在專家之間鑽研，一般民衆難以窺其堂奧。所幸，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甲骨文研究的學者已經體認到走出象牙塔與社會結合的必要性。而將甲骨文知識與公眾考古學的理念與行動相結合，無疑將是一條可以發展的方向。

後記：本文原宣讀於「甲骨文與文化記憶世界論壇」（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承李宗焜先生賜閱一過，有所指正，謹此致謝。